

ical

heritage contemporary speech

Historical heritage contemporary speech

再世波士頓

胡翼青 / 著

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Historical heritage contemporary speech

Historical heritage contemporary speech

再度发言

胡翼青 / 著

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 / 胡翼青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00-7681-0

I. 再… II. 胡… III. 芝加哥学派—传播学—研究
IV. F091. 353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785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 任 编 辑 陈 光
责 任 印 制 杨海涛
装 帧 设 计 海马书装
出 版 发 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093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 本 710 × 960 毫米 1 / 16
印 张 2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7681-0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研究成果综述	11
三、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15
第一章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及其传播研究	22
第一节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兴起的历史背景	22
一、学派兴起的社会背景	23
二、学派兴起的学术背景	31
第二节 芝加哥社会学的创立、兴盛和衰落	44
一、哈珀校长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44
二、斯莫尔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	46
三、芝加哥学派的辉煌	49
四、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51
第三节 作为美国传播学源头的芝加哥学派	58
一、芝加哥传播思想产生的时代必然性	59
二、芝加哥传播思想产生的学术必然性	63
第二章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渊源	68
第一节 经典社会学家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	69
一、齐美尔的重要影响	70
二、对塔德传播思想的继承	79
第二节 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传播思想	91
一、皮尔士和他的符号学	91
二、詹姆斯：符号互动论的先驱	96

第三章 杜威与库利:芝加哥传播思想的开端	106
第一节 杜威:芝加哥传播思想的基石	107
一、杜威的传播观	108
二、传播与社会建构	113
三、传播与民主的实现 :杜威的终极理想	118
第二节 库利:芝加哥传播思想的助产士	127
一、“镜中我”与社会的形成	128
二、传播与社会有机体的形成	131
三、传播技术主义的萌芽	134
四、库利传播理论的局限及其影响	138
第四章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芝加哥学派的宏观传播思想	141
第一节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帕克时代的传播思想	142
一、帕克的技术主义观点	145
二、伯吉斯的技术主义观点	152
第二节 传统的延续:伊尼斯与媒介技术主义范式的奠基	157
一、伊尼斯眼中的媒介	158
二、媒介与人类文明	163
三、对伊尼斯理论的评析	166
第三节 麦克卢汉的承继与技术主义范式的繁荣	172
一、芝加哥学派式的传媒观	174
二、理论与方法的拓展与技术主义范式的成型	179
第五章 符号互动:芝加哥学派的微观传播思想	187
第一节 符号互动:米德的社会心理观与传播观	188
一、符号互动的起点:从姿态到语言	190
二、源于传播的自我	196

三、互动与组织、群体的形成	201
四、天使般的交流与大同世界的实现	205
第二节 拟剧理论:戈夫曼对传播的全新阐释	214
一、框架:信息的载体与平台	215
二、前台与后台:传播的二元对立	222
第三节 “信息场景”:拟剧理论的传播学再造	227
一、梅罗维茨的理论整合	228
二、中台:新媒介时代的拟剧理论	232
三、新媒介的功能与美国社会的未来	236
第六章 控制与效果: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的系统研究	241
第一节 帕克的社会控制研究	243
一、传播与社会关系重组	245
二、传播与移民的美国化	249
三、来自报社内部的控制	256
第二节 电影与青少年行为:布鲁默的效果研究	260
一、佩恩基金研究与布鲁默的介入	262
二、电影的社会效果	267
三、电影的心理效果	274
第三节 继承与变异:拉斯韦尔与芝加哥传统	279
一、青年拉斯韦尔的方法论倾向	281
二、拉斯韦尔的理论体系	284
三、拉斯韦尔的理论转型	289
第七章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特征与贡献	294
第一节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范式归属及其特征	295
一、芝加哥学派与批判主义范式	295
二、芝加哥学派与经验传播学主流: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例	306

三、芝加哥学派与技术主义范式	318
四、芝加哥传播思想的总体特征	323
第二节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与局限	326
一、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历史贡献	326
二、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历史局限	337
 第八章 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学科革命	353
第一节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延续	353
一、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主流范式的转型	354
二、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改革	362
三、芝加哥传播理论的当代继承者	365
第二节 重归芝加哥学术精神：传播学的范式革命	375
一、传播学第二次危机与其出路的探讨	376
二、人本主义范式与芝加哥学派	383
 附录一 简明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大事年表	390
 附录二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总谱系图	393
 主要参考文献	394
 后 记	408

导 论

一、问题的缘起

为什么是芝加哥学派？——在我将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不少传播学界的同仁关切地询问：为什么不把宝贵的精力投放在别的什么学派，比如哥伦比亚学派或是耶鲁学派，哪怕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好？

我知道，从传统传播学研究的角度，由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 Merton）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由霍夫兰（Carl I. Hovland）领衔的耶鲁学派，以及由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似乎比芝加哥学派有更大的影响。

我知道，在业已定格的“经典视野”中，芝加哥学派几乎没有一个专门的传播学家，似乎也谈不上是一个传播学的学派。在 21 世纪的今天，讨论芝加哥学派似乎实在是不够前卫。

我也知道，这种关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映象恰恰投射、承载着国内外传播学界对传播思想史根深蒂固的主流观点。

在接受了近些年的“社会学洗礼”之后，我对自己的学术道路的新起点作出选择：全面发掘、审视、推介芝加哥学派传播理论谱系，以表达对国内外传播学主流观点的扬弃，以及对传播学

未来发展的思考。

中国的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甚至整个传播学理论，受到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极大影响。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一书中，施拉姆曾经高度评价了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勒温（Kurt Lewin）和霍夫兰等四大奠基人所开创的传播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来的传播学奠定了基础。（Schramm, 1997: 3）^①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施拉姆的看法似乎像圣经一样左右着传播学界的看法，“四大奠基者”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在美国，如黄旦描述的那样：“大众传播的四个奠基人是施拉姆所选择并树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此提出疑问的并不多，更没有人打算颠覆之。相反，顺其思路的倒是所在多有。”（黄旦，2004）在中国似乎更是如此，许多传播学教科书都用以下的方式来讨论传播学的缘起：“每当人们谈起与传播学产生有关的事件与人物，有人会列举电话的发明、广播的出现和电视的影响，有人会提到香农的信息论和韦弗的控制论……但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评介的应是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出现的四位创始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还有传播学的完善者——施拉姆。”（邵培仁，2000: 13）“传播学在美国形成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宣伟伯^②把其中4位即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实，在传播学形成

① 尽管在这部著作中，施拉姆也提到了库利、帕克和萨丕尔的传播研究，但他们完全是一带而过，与对四大奠基人的详尽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从本书后面的阐述来看，无论如何，库利、米德、杜威，尤其是帕克，在传播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勒温。

② 威尔伯·施拉姆的早期译名。

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相当于或至少不亚于这 4 位的贡献，……但宣伟伯的这个意见对于了解传播学形成的脉络以及宣伟伯本人的偏爱都是有意义的。”（戴元光、金冠军，2000：33）

事实上，传播学的源头即使不是无限多元的，恐怕也不会是一元的。在四大奠基人之前从事过系统传播研究的学者，甚至还远远不止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在美国本土，当时从事演讲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为数众多，像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样的非学院派传播研究者恐怕也不容忽略。放眼整个世界，情况则更为复杂。正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在 20 世纪有两个时期，交流的观念曾经是思想论争的热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论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论争。“自从第一次论战开始，传播理论的一切可能的思想选项都已经清晰可见了。在哲学里，‘交流’是一个核心的观念。……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思潮里，对许多人进行的大规模传播，无论这许多人是‘群众’、‘大众’、‘人们’还是‘公众’，都成为一个研究主题。……在世界各地，‘传播’的问题都提上了议程。”（彼得斯，2003：8—9）在此期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杜威（John Dewey）、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艾略特（T. S. Eliot）、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交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探索。也就是说，在一战前后，传播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在这些研究者中，最为系统的传播理论还是来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根据施拉姆的本意，选择以拉斯韦尔为首的四人充当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如下：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推动了传播理论和方法

的发展，其中三人建立了研究和教育培训的机构，指导过大批的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均发生在传播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出现之前。（Wilbur Schramm, 1997）根据这一标准，可以成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实在是很多，杜威、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帕克（Robert Park）、萨丕尔（Edward Sapir）、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扳着手指数不过来。按照罗杰斯（E. M. Rogers）的看法，施拉姆这么做是非常精明的：“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罗杰斯，2002：498）而黄旦则认为，罗杰斯的看法并不合理，因为即使施拉姆看不起来自欧洲的霍克海默等学者，把杜威、库利和帕克等人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实在算不得辱没门庭。施拉姆之所以“钦定”这四位奠基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非常类似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而且这种视野和方法受到施拉姆的高度认同。“在这样多元，如此丰富的研究中，施拉姆选择了这样四个所谓的奠基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四个奠基人的研究确定了传播研究领域，不如说是施拉姆按照自己的口味，他对传播研究的理解和设想，找到了他所认为的研究起点，找到他所欣赏和满意的人选，并遵循这样的线路，进一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黄旦，2004）黄旦的说法很有道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施拉姆在设定美国大众传播学发展之路时存在主观性与个人喜好，其选择标准并不科学。

我注意到，施拉姆在分析帕克等人对传播学的贡献时，曾从反面提出了他所认可的传播学奠基人的标准。他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研究者对传播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而言，这是一种被放在第二位的研究兴趣，仅仅是他们主攻学科的一个例证，而且他们中没有

一个人采用与当代社会科学紧密相联的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问题。”（Schramm, 1997: 14）在这里，施拉姆部分地披露了他的意图：由于他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中没有一人可以被称为主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因此他关于传播奠基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定量研究”。这是一种偏见，完全站不住脚。孔德（A. Comte）、斯宾塞（H. Spencer）、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也没有采用现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方法，但恐怕没有人敢说他们不是社会学的奠基人。

参照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情况，我倒是想提出一个关于传播学奠基人的相对严格的标准：首先，该学者的研究是否形成了关于传播研究的清晰线索或框架；其次，是否（可能是不经意或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被证明有价值的传播理论；其三，是否为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设定过一些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如果从这三个维度来看芝加哥学派，该学派整体、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甚至是该学派的先驱人物，都可以被看作是传播研究的奠基者。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到目前为止传播学领域视野最为宽广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传播理论，启发了相当可观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和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并对传播研究的方向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思考。如果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美国传播学的所谓四大奠基人和所谓集大成者，恐怕只有拉斯韦尔和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符合标准。颇有意味的是，晚年的拉斯韦尔可以悖离一切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独不能否定在他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前，他那些被认为是奠基性的传播理论，基本上属于芝加哥学派的旨趣。

着眼于传播学的今天和明天，颠覆施拉姆的错误观点很有必

要。作为一个冷战色彩很浓、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的传播研究者,^① 施拉姆不欣赏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取向, 本属无可厚非。然而, 他干脆把芝加哥学派在传播研究方面的功绩完全抹去, 使之与传播学毫无关联, 并因此歪曲了传播理论发展的历史, 这就离谱了。作为传播学的开创者介入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 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 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思想发展的基因图谱, 封杀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 对学科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施拉姆曾坦言,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 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 来组织, 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宣伟伯、余也鲁, 1988: 15) 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施拉姆本人恐怕难辞其咎。^②

如今一个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很有可能对杜威、库利、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帕克、伯吉斯 (Ernest W. Burgess)、布鲁默 (Herbert Blumer)、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等学者的传播学思想一无所知, 甚至对其大名闻所未闻。提到传播学的奠基人, 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施拉姆钦定的四位人选。也就是说, 在今天的传播学人中, 充斥着不尽正确的传播思想史的观念。针对这种情况, 黄旦尖锐地指出: “社会学对大众传播学的产生、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而又极其直接的, 以至于

① 施拉姆早期的重要代表作《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一个明证。这本书在形式上似乎超然于价值观, 但在实际上, “在‘客观’、‘超然’的外表下, 它是环境的产物, 除了那个冷战时代的影响, 还有美国私人所有、追求利润的媒介模式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在施拉姆所写的那部分文章中, 冷战思维表现得比较明显。然而, 在特定时代受特定思维方式和环境扭转影响的产物, 由于是以‘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的, 其影响便作为学术传统被保留下来。而这当然是有害的。”(郭镇之, 1997: 214, 216 -217)

② 当然, 我无意否定施拉姆对传播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正面影响, 只是这并非本书的主题。

今人谈大众传播学史如不从杜威、库利和帕克等说起，恐就有数典忘祖之嫌。”（黄旦，1997：26）

在我看来，这远不只是一个“数典忘祖”的问题。在讨论学术思想史的意义时，熊彼特（J. Schumpeter）有过很精彩的论述：“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熊彼特，2001：17）熊彼特对于学术思想史意义的分析昭示我们：不顾最起码的历史面貌，主观随意地裁定传播学的奠基人，只会错误地构建人们头脑中的知识谱系。更糟糕的是当人们的思想囿于某种片面、错误的知识谱系时，就会丧失多种可能的研究方向。毫无疑义，只有回到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的原本真实存在的传播学源头，才有可能使传播研究重归正确的发展方向。对此，凯瑞（James W. Carey）犀利地指出：“传播的传递观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直占据美国思想的主流地位。我刚涉足这一领域时，发现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术语对这一观点的表达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但是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尽管并不完备）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凯瑞，2005：11~12）

我认为，对芝加哥学派“集体失忆”的第一个结果是使传播学本该更加丰富的理论基因库中流失了一个重要的部分。由于在主流传播学的视野中，传播学肇始于四大奠基人，而他们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传播研究势力又过于强大，因此对芝加

哥学派传播思想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广泛开展过。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学派，芝加哥学派对于社会学的开拓与影响，西方社会学家早已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卷帙浩繁，据说不下 1000 种。然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传播学界和社会学界所忽视，很少有学者系统整理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以致“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很少为今天的传播学学者所引用。”（罗杰斯，2002：204）包括罗杰斯、彼得斯和切特罗姆（Daniel J. Czitrom）等在内的传播思想史研究者都在其著作中触及了这一论题，可均未形成专门的研究成果。能够查寻的专门研究只有贝尔曼（Sheldon Lary Bleman）于 1975 年在伊利诺斯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思想中的传播观念》（*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未出版，收藏于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领域，尚未出现关于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研究的专著，^① 连相关论文都比较罕见。^② 在汗牛充栋的传播学教材中，提及芝加哥学派贡献的凤毛麟角（郭庆光，1999），多数教材几乎只字不提，甚至包括一些很有影响、几乎涉及所有传播研究主要流派的教材（李彬，2003）。然而，正如本书所要重点阐释的那样，在芝加哥学派成员璨若群星的社会学著作中，散落着珍珠般闪闪发光的传播学思想，甚至有几部书本

^① 陈卫星教授在其专著《传播的观念》一书中专门提及了芝加哥学派一些代表人物的研究，不过涉之不深，受到切特罗姆观点的较多影响。我本人在《传播：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中，也有部分文字提及芝加哥学派，当时主要的参考文献也是切特罗姆的书，现在看来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② 根据我所搜集的素材，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对芝加哥学派整体作过较为详细描述的论文只有黄旦的《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黄旦，2004），对于芝加哥学派中个别学者进行专述的论文主要出自芮必峰之手（芮必峰，1995；1997；2004），邵培仁、单波、张军芳、许加彪等学者也发表过较为零散的有关芝加哥学派个别学者的研究论文。

身就是传播学著作。这些思想有的确已过时，但有的依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对传播学当前和未来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些思想并不像人们臆想的那么毫无章法，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秩序。它们的存在，使我确信，重新发掘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对于丰富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宝库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本书的选题首先基于这样的提问：“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挖掘和梳理芝加哥学派丰富多彩的传播学思想。

对芝加哥学派“集体失忆”的第二个后果，就如熊彼特所说，已经使传播学研究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或者起码使传播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过于狭窄的视野中。我无意否定传播学的四大奠基者对传播学重要的开创性作用，但也不能将其奉为传播学发端的唯一动力。不容否认的是，将传播学研究的视域完全置于四大奠基人所圈定的藩篱中，已经束缚了传播学的全面发展。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罗杰斯，2002：204）四大奠基人中对传播学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位实证主义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拉斯韦尔，他们开创的范式可以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范式或实证主义范式。与芝加哥学派关注传媒与社会变迁互动不同，实证主义者更关注媒介自身的运作，学术视野并不开阔。另外，他们对静止结构的热衷和对动态过程的忽视，也使他们与芝加哥学派截然不同。他们对传播和传媒的定义比芝加哥学派狭窄得多。这些年来，实证主义作为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在传播学诸领域的开拓令人失望，几乎在研究的各个战场上都驻足不前。很重要的原因是，静止的传播结构研究远远落后于动态的传

播技术革命。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学科危机。

发人深省的是，为四大奠基人关闭的传播学已有的认识通道，多半来自芝加哥的传统，比如具有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的思想、^① 人本主义的研究理念、定性的研究方法、传媒生态的理论等。将传播学的源头回溯到芝加哥学派那里，并不仅仅具有传播学术史或传播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重新理解人类传播活动的现实理论意义。由于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仰仗传播而维系，因此它所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实证主义者对传播涵义的限定。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的理解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的视角重新审视传播，传播学的研究就有可能走出“五W”模式的狭窄天地，向更为宏观的研究方向——如传播与人性或者传播与社会生态的关系拓进。因此，走出结构功能主义的禁锢，追寻、追释和追续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理论谱系，对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史进行重新思考，对于解决当前的传播理论危机以及未来传播学理论与学科的发展、范式的转型与革命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今天，传播学的发展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时刻，摆脱施拉姆的误导，以更多元的视角重新来审视传播问题或者是交流问题将是传播学走出困境的第一选项。这一点，目前有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凯瑞，2005；黄旦，2004），他们中有人明确地表述说：“行为主义研究，影响深远，似乎一提传播学，就是由四大奠基人首创。我们的视野也囿于这样的知识地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传播学多元源头的探究就显得十分必

^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芝加哥学派的世界观与当代的建构主义思想还是有所差别的，但由于两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看法较为相似，因此我认为可以称芝加哥学派具有建构主义的倾向。